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1.01.002

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价值

秦 蒙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卡莱茨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提出了垄断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基于有效需求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继承卡莱茨基经济思想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调收入分配是总需求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逐渐发展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标准范式之一。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制度要适应经济增长体制”等经济思想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也可以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但应注意结合经济实践对其进行优化;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只有不断发展,并应用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卡莱茨基;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有效需求;工资份额;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1-0012-12

一、引言

罗宾逊(1983)认为,卡莱茨基没有受过新古典正统派的熏陶,他所学过的唯一经济学是马克思的经济学^[1]。Boddy 和 Crotty (1975)指出,卡莱茨基的研究以马克思的两部类范式为基础,并将他的研究拓展到了垄断背景^[2]。卡莱茨基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对资本主义长期波动和长期发展的基本力量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具体化阐述,并最终提出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理论,成为对经济增长和周期进行现代化分析的先驱之一。

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微观部分包括垄断定价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宏观部分涉及有效需求理论、商业循环理论和长期发展理论^[3]。卡莱茨基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垄断定价理论为基础解释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对抗的新形式,并认为资本主义垄断程度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变动又会对国民收入变动产生影响。第二,以有效需求理

* 收稿日期:2020-08-12;修回日期:2020-10-22

作者简介:秦蒙(1992),女,江苏扬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E-mail:qinm15@ruc.edu.cn。

论为基础阐述了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在工资与利润的分配状况既定情况下,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决定了可以实现的利润和可以销售的总产出;其中,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投资下降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产出、利润和收入下降,使经济陷入一个向下循环的螺旋运动中。根据上述观点,卡莱茨基抨击了新古典正统派的经济增长政策(即用削减工资率的方式减少失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削减工资率会导致工人消费支出下降,而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在长期比较稳定且增长缓慢,因而社会总消费支出呈下降趋势;消费支出的下降会通过限制利润的实现限制投资支出,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增加的产出无法销售出去,资本家只能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来实现产品市场均衡^[1]。

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19世纪70年代起,边际主义的兴起导致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偏向对主观价值理论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分析思想被抛弃。直到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后,哈罗德和多马等才恢复了早期的研究传统。而卡莱茨基比凯恩斯还早3年提出了相似的理论,且卡莱茨基的理论不仅包括有效需求理论和商业循环理论,还涉及垄断定价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这两个理论是连接卡莱茨基经济理论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的纽带),并构建了包含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经济理论体系。正因为此,卡莱茨基成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思想启蒙者之一。

近年来,继承卡莱茨基经济思想的卡莱茨基主义学派成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分支,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更是发展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的标准范式之一^[4]。这一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调收入分配是总需求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基于卡莱茨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卡莱茨基的收入分配理论,通过设定不同的储蓄和投资函数分析收入分配变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工资具有双重效应:更高的工资会通过提高工人购买力来刺激消费需求(“需求效应”),但也会因为提高单位生产成本而抑制投资(“成本效应”),根据这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经济增长率可能随着工资率上升而上升或下降。具体来说,当“需求效应”大于“成本效应”时,经济增长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此时应通过提高工资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而当“成本效应”大于“需求效应”时,经济增长体制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此时则应通过降低工资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虽然这一理论框架最初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其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制度要适应经济增长体制等思想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也可以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但应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优化。需要强调的是,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只有在不断发展中才能真正体现其当代价值。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出了新课题,需要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不断发展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二、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

1. 有效需求理论

卡莱茨基在1933年出版的《商业循环理论大纲》一书中,独立提出并详细分析了与凯恩斯相似的有效需求理论^[5]。此后,卡莱茨基借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有效需求理论进行了数理上的验证^[6]。具

体来说,卡莱茨基假设存在3个部门(见表1):部门1生产投资品,部门2和部门3分别生产资本家消费品和工人的工资消费品; P_1 、 P_2 、 P_3 分别为3个部门的利润(扣除折旧之前), W_1 、 W_2 、 W_3 分别为3个部门的工资, P 和 W 分别为3部门的加总利润和加总工资, I 为投资, C_k 为资本家消费, C_w 为工人消费, Y 为国民收入(扣除折旧之前)。

表1 3部门再生产图示

	部门1	部门2	部门3	合计
利润	P_1	P_2	P_3	P
工资	W_1	W_2	W_3	W
合计	I	C_k	C_w	Y

假设工人不储蓄,且不存在产品库存(即所有产品都被卖出),可以得到3部门间的“交换公式”:部门3中的利润 P_3 (部门3支付完 W_3 后的剩余)以工资消费品的实物形式存在,并被卖给部门1和部门2的工人,则 $P_3 = W_1 + W_2$ 。等式两边分别加上 $P_1 + P_2$,得到: $P_1 + P_2 + P_3 = P_1 + W_1 + P_2 + W_2$ 。因此有: $P = I + C_k$ 。

令3个部门的工资份额分别为: $w_1 = W_1/I$, $w_2 = W_2/C_k$, $w_3 = W_3/C_w$,则有: $(1-w_3)C_w = w_1I + w_2C_k$ 。那么,工资消费品总价值 $C_w = \frac{w_1I + w_2C_k}{1-w_3}$,国民收入 $Y = I + C_k + C_w = I + C_k + \frac{w_1I + w_2C_k}{1-w_3}$ 。

因此,在工资与利润的分配状况既定的情况下(即 w_1, w_2, w_3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决定了可以实现的利润 P 和国民收入 Y 。

根据有效需求理论,卡莱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和经济产出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人的消费支出,而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几乎无弹性,因此消费需求是有效需求中的一个消极因素,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需求不足。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它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企业可获得的资金(储蓄和借款),二是预期利润率,三是资本存量。在卡莱茨基看来,当资本主义经济达到繁荣顶点时,投资和利润水平均达到最高值,且不再变化;保持高投资水平,则滞后的资本存量会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增加,而利润水平保持不变会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会导致投资下降,投资下降又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产出、利润和国民收入进一步下降,使得经济陷入一个向下的螺旋运动中,直至衰退的最低点^[7]。据此,卡莱茨基利用投资波动导致的有效需求波动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变化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与卡莱茨基相似的理论,但卡莱茨基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分析体系存在根本性分歧。尽管凯恩斯同样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的根本性原因,但他却将投资和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于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8]。具体来说,对于消费,凯恩斯用消费者心理来解释国民收入与消费需求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影响一般总消费和总储蓄的因素,而不考虑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间的分配关系;对于投资,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益的不确定性和利率的长期不变性是阻碍投资达到充分就业所需水平的主要因素。

2. 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卡莱茨基进一步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即资本积累)过程。假设资本存量为 K , r 为积累率, δ 为折旧率,资本积累公式可以表示为: $I = (r + \delta)K$ 。再假设资本家消费品价值 $C_k = nP$ (考虑长期增长过程),于是有: $C_k = nP = n(I + C_k) \rightarrow C_k = \frac{n}{1-n}I = \rho I$ 。进而可得到:

$$Y = (1 + \rho)I + \frac{I(w_1 + m w_2)}{1 - w_3} = I \left(1 + \rho + \frac{w_1 + m w_2}{1 - w_3} \right) = K(r + \delta) \left(1 + \rho + \frac{w_1 + m w_2}{1 - w_3} \right)$$

对上式求微分可得: $\frac{dY}{dK} = \frac{Y}{K} = r + \frac{Y}{rK}$ 。令资本产出比(Y/K)为 ε ,净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rK/Y),也

称为投资率或积累率)为 a , 则: $r = \frac{a}{\varepsilon}$ 。令经济增长率为 g , 则:

$$g = \frac{\Delta Y}{Y} = \frac{\Delta K}{K} = \frac{I - \delta K}{K} = \frac{I}{K} - \delta = \frac{(r + \delta)K}{K} - \delta = r$$

因此, $g = a/\varepsilon$ 。当资本产出比 ε 保持不变时(不考虑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率 g 取决于积累率 a 。这一公式与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所表达出的数量关系($g = s/\varepsilon$)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回避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 用国民收入储蓄率 s 取代资本积累率 a , 掩盖了工人工资收入和资本家收入的区别, 因为净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 a 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人间的收入分配^[6]。

3. 垄断竞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 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自由竞争阶段, 马克思本人也并未对“产能利用率”这一问题做出具体论述^①。凯恩斯也只是关注了投资的收入增长效应, 并未考虑投资的长期产能创造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加批判地继承了新古典竞争模型^[12]。但是, 在 19 世纪 70 年代,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竞争阶段过渡。到 20 世纪初, 在英、美、德等国已经形成垄断资本主义^②。在垄断竞争这一新的竞争状态下,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问题需要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新的竞争形式下, 利润率并非一定趋于一致, 拥有过剩产能成为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并成为企业应对需求不确定性和确保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 企业间价格竞争趋于瓦解, 而非价格竞争成为常态^[14-15]。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是最早强调“垄断竞争”和“产能过剩”的两位学者, 此后以斯威齐和巴兰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学派兴起。

卡莱茨基强调,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垄断竞争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性质导致经济中过剩产能成为常态, 这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理论分析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 “产能利用率”成为一个长期可调整变量, 并对投资行为和国民收入产生关键性影响; 第二, 垄断因素因企业家定价决策的影响而对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至关重要, 且这些影响随着进入壁垒、资本集中度和规模经济的提升而不断深化^[16]。垄断程度、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组表示:

$$Y = u\sigma K, \frac{W}{p} = wL = wyu\sigma K, \Pi = Y - W, p = (1 + \theta)C, C = pW/y, w = (1 - m)y$$

其中, u 是产能利用率($u = Y/Y^*$, Y^* 为潜在产出), σ 为全产能下的产出资本比($\sigma = Y^*/K$), W 为工资, w 为实际工资率, p 为垄断价格, θ 为常数, C 为边际成本, L 为劳动成本, y 为劳动生产率($y = Y/L$), m 为垄断程度。垄断程度 $m = \theta/(1 + \theta)$, 在数量上等于边际产出的利润份额, 是对垄断企业控制价格水平能力的一个粗略计算。一般来说, 垄断程度越高, m 的值越大。可以发现, 当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时, 实际工资率取决于垄断程度。

进一步可以求得利润率为: $r_k = \frac{p\Pi}{pK} = \frac{u\sigma K - wyu\sigma K}{K} = u\sigma(1 - wy)$ 。其中, r_k 为卡莱茨基分析框架下的利润率。可见, 当产能利用率 u 为一个可调整变量时, 实际工资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利润率的下降。

① 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 在自由竞争阶段, 企业为努力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 并不会保留期望外的过剩产能, 因此,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 “产能利用率”是保持在完全产能水平或一个正常利用水平上的^[9-11]。也就是说, 当出现计划支出水平不足问题时, 只会表现为生产过剩, 而不是产能利用水平不足。

② 1873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中, 科学技术迅速进步, 生产能力突飞猛进, 资本主义竞争日益激烈, 同时, 垄断组织有了广泛的发展; 到 20 世纪初, 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形成^[13]。

只有当 $\frac{dr_k}{dw} = \frac{du}{dw} \sigma(1-uy) - u\sigma y < 0$ 时,实际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反向相关关系才会成立。

因此,卡莱茨基认为,在不降低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依旧可以提高利润率:产能利用率越高,产出越高,利润率就越高。在此基础上,卡莱茨基抨击了新古典正统派“可以通过削减工资率的方式减少失业”的观点:削减工资率会导致工人消费支出下降,而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在长期比较稳定,且增长缓慢,因而社会总消费支出会趋于下降;消费支出的下降则通过限制利润的实现来制约投资支出,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增加的产出无法销售出去,资本家只能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来实现产品市场均衡。卡莱茨基还进一步强调,如果通过垄断势力在工资成本下降时制止物价下跌,情况会更糟,因为购买力的减小会引起消费品销售的降低^[1]。

三、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及其应用

卡莱茨基主义不但被视作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近年来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已经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的标准范式之一。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以卡莱茨基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从总需求角度分析增长与分配这一宏观经济学经典问题。适用于长期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由罗桑(1981)和 Dutt (1984) 分别提出^[17-18],并出现在 Taylor (1985)、Amadeo (1986) 以及 Committeri (1986) 等的研究中^[19-21]。这些最初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为“标准卡莱茨基主义模型”(或“新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此后,这一标准模型被不断改进和拓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巴杜里和马格林在 1990 年提出的增长与分配模型,这一模型也被称为“后卡莱茨基主义模型”或“巴杜里-马格林模型”^[22]。这些模型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卡莱茨基的分析传统,其分析框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一是强调垄断的作用,价格受垄断程度影响,且产品定价表现为成本加成形式;二是阶级冲突和垄断影响工资率,且工资的储蓄倾向小于利润的储蓄倾向(或假设工资没有储蓄);三是“产能利用率”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一个内生的、可调整的变量;四是投资函数主要取决于盈利能力和产能利用程度^[16]。

1. 从标准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到巴杜里-马格林模型

本文所介绍的增长模型都是最简单的基础模型,并有一系列假设:处于一个封闭的两部门经济系统中,劳动供给没有限制,劳动力是生产所需的唯一投入,只生产单一产品,没有间接劳动或间接成本^①,工人的工资没有储蓄。标准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用下述方程组表述:

$$\text{储蓄函数: } \frac{I}{K} = \alpha + \beta u + \gamma r$$

$$\text{投资函数: } \frac{S}{K} = sr = s\pi u \sigma$$

$$\text{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 } \frac{I}{K} = \frac{S}{K}$$

$$\text{利润率: } r = \pi u \sigma$$

$$\text{定价规则: } \pi = \bar{\pi}$$

① 这里的间接劳动是指资本主义部门雇佣的非生产性工人,如行政人员和其他关键的员工,其数量不受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间接成本则是指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支出。需要说明的是,罗桑的原模型中是考虑了间接成本的,但为了进行更直接的模型比较,在基本模型中未考虑间接成本问题。

$$\text{经济增长率: } g = \frac{I}{k} - \delta$$

其中,投资是产能利用率 u 和利润率 r 的增函数,储蓄率 s 是利润份额 π 的增函数,利润份额由边际成本的加价确定,边际成本为常数且等于单位劳动成本。联立上述方程组可求得均衡解:

$$u^* = \frac{\alpha}{s \bar{\pi} \sigma - \beta - \gamma \bar{\pi} \sigma} \quad g^* = \frac{\alpha s \bar{\pi} \sigma}{s \bar{\pi} \sigma - \beta - \gamma \bar{\pi} \sigma} - \delta$$

假设凯恩斯主义稳定性条件成立,即: $\frac{\partial(I/K)}{\partial u} = \beta + \gamma \bar{\pi} \sigma < \frac{\partial(S/K)}{\partial u} = s \bar{\pi} \sigma$ 。那么,收入分配变化(即利润份额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为:

$$\frac{d u^*}{d \bar{\pi}} = \frac{-(s-\gamma) \sigma u^*}{s \bar{\pi} \sigma - \beta - \gamma \bar{\pi} \sigma} < 0 \quad \frac{d g^*}{d \bar{\pi}} = \frac{-\beta s \sigma u^*}{s \bar{\pi} \sigma - \beta - \gamma \bar{\pi} \sigma} < 0$$

标准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宏观分析范式,这一模型的核心在于强调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通过考察收入分配变动对模型均衡点的影响来分析工资份额提高(或降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当 $d u^* / d \bar{\pi} < 0$ 时,工资份额提高会提高有效需求,进而提高产能利用率,但利润率是下降的,以罗桑、达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称这样的经济体为“停滞体制”;当 $d g^* / d \bar{\pi} < 0$ 时,工资份额提高会增加总需求,并使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同时提高,这样的经济体则被称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这是巴杜里-马格林模型中的术语)。

巴杜里和马格林(1990)对标准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批判^[23]。他们认为,标准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中的投资函数对利润率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的相对反应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并由此排除了利润引导型扩张的可能性^①。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投资方程:

$\frac{I}{K} = \alpha + \beta u + \gamma \pi$ 。在这一方程中,投资取决于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而不是取决于利润率和产能利用率。

假设凯恩斯主义稳定性条件依旧成立($\beta < s \bar{\pi} \sigma$),则均衡解变为:

$$u^* = \frac{\alpha + \gamma \bar{\pi}}{s \bar{\pi} \sigma - \beta} \quad g^* = \frac{s \bar{\pi} \sigma (\alpha + \gamma \bar{\pi})}{s \bar{\pi} \sigma - \beta} - \delta$$

收入分配变动对均衡解的影响变为:

$$\frac{d u^*}{d \bar{\pi}} = \frac{s u^* \sigma - \gamma}{s \bar{\pi} \sigma - \beta} < 0 \text{ 或 } > 0 \quad \frac{d g^*}{d \bar{\pi}} = \frac{s \sigma [\gamma \bar{\pi} (s \bar{\pi} \sigma - 2\beta) - \alpha \beta]}{(s \bar{\pi} \sigma - \beta)^2} < 0 \text{ 或 } > 0$$

据此,巴杜里和马格林指出:(1)当 $d u^* / d \bar{\pi} < 0$ 时,经济体是一个“停滞体制”,即工资份额提高会提高有效需求,进而提高产能利用率,但利润率下降;当 $d u^* / d \bar{\pi} > 0$ 时,经济体是一个“繁荣体制”,即利润份额提高会提高有效需求,进而提高产能利用率,但工人工资份额下降。(2)如果 $d g^* / d \bar{\pi} < 0$,经济体是一个“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即是一个以大规模消费为基础的、工资引导型的扩张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主导地位,更高的工资份额通过增加总需求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如果 $d g^* / d \bar{\pi} > 0$,则经济体是一个“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即是一个以投资为基础的、利润引导型的扩张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投资和利润在总需求中占主导地位,更高的利润份额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2. 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经验性应用

基于巴杜里和马格林在1990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许多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

① 按照标准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给定产能利用率则利润率的提高必然刺激投资,给定利润率则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也必然刺激投资。但是,后者不一定成立:如果利润率不变,尽管产能利用率上升,但利润份额一定会下降;而利润份额下降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且没有先验的证据表明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一定会抵消利润份额的消极影响。

了一系列的实证检验(参见表2)^[24]。早期的研究多针对发达国家,时间区间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1世纪初,使用的计量分析方法多为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和VAR(Vector Autoregressive,向量自回归),且大都区分了“国内需求体制”和“总需求体制”。

首先,从使用的计量方法看,OLS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主要针对时间序列。不过这种处理方式存在较多不足,比如序列相关性问题等。为了消除序列相关性的影响,可选择进行AR(1)处理(即进行一阶自回归处理)或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处理,或者添加工具变量(通常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即2SLS)。不过由于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较高,且在构建模型时很难找到恰当的工具变量,因此,大部分学者在处理时间序列的内生性问题时依旧选取AR(1)处理或ARIMA处理方法。VAR模型则是对AR模型的拓展,即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拓展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目前这种方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对时间序列的分析中。

其次,从“国内需求体制”和“总需求体制”的区分看,进行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考察和比较封闭经济需求体制和开放经济需求体制。所谓“国内需求体制”,就是基于封闭经济模型,忽略净出口需求的作用,只考虑国内工资变动对国内需求(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影响;所谓“总需求体制”,就是基于开放经济模型,考虑工资变动对总需求(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净出口)的影响。

封闭经济的产品市场均衡条件为: $s\pi u\sigma = i(\pi, u)$

开放经济的产品市场均衡条件为: $s\pi u\sigma + M = i(\pi, u) + E$

其中, M 和 E 分别代表本币衡量的进口支出和出口支出。

根据上述两个均衡条件可得:

“国内需求体制”的判断方程式: $s\pi\sigma du + su\sigma d\pi = i_{\pi} d\pi + i_u du$

“总需求体制”的判断方程式: $du = [D^{-1}(i_{\pi} - su\sigma) d\pi] + [D^{-1}\varepsilon u(n_e + n_m - 1)(d\theta/\theta)]$

为表述的简便,这里用非线性函数表示投资函数,凯恩斯主义稳定性条件表示为: $s\pi\sigma - i_u > 0$ 。因此, $D = \varepsilon u + s\pi\sigma - i_u > 0$ 。 ε 为收入中进出口的初始份额, n_e 和 n_m 分别为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 θ 代表国际价格竞争力。从“国内需求体制”看,如果 $dg/d\pi < 0$,则是“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反之,则是“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总需求体制”的判别则相对复杂:等式右边第一部分表示本币贬值通过利润份额变化对产能利用率产生的影响(被称为“收入分配效应”),第二部分表示本币贬值通过产品价格国际竞争力变化对贸易均衡产生的影响(被称为“贸易效应”)。如果“国内需求体制”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则“收入分配效应”为正;如果“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则“收入分配效应”为负;由于本币贬值通常会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n_e + n_m > 1$),因而“贸易效应”通常为正。“收入分配效应”和“贸易效应”均为正,“总需求体制”就是“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而“收入分配效应”为负时,“总需求体制”不确定;一般来讲,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即 ε 、 n_e 和 n_m 增大),正向的“贸易效应”会抵消负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使“总需求体制”表现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

最后,从实证结果看,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需求体制”都是“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而国际贸易则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总需求体制”转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其国内实际工资率下降,但这并不能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往往会导致国际贸易效应在全球层面上互相抵消,因而即使一些国家由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转变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但世界经济作为整体仍然可能是“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27]。可见,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对于实现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那么需要采取亲劳动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实际工资率、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工人议价能力、降低工资差距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体制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

那么需要采取亲资本的分配政策,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实行工资限制等。

表 2 部分采用巴杜里-马格林模型的实证研究文献

作者	被检验的国家	研究时间区间	估算方法	国内需求体制	总需求体制
鲍尔斯和博耶(1995)	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	1961—1987年	OLS AR(1)	工资引导型	法、德、日为利润引导型;英、美为工资引导型
戈登(1995)	美国	1955—1988年	2SLS	利润引导型	利润引导型
斯托克哈默和奥纳兰(2004)	法国、英国、美国	法国:1972—1997年 英国:1970—1997年 美国:1966—1997年	SVAR	—	没有显著的结果
奥纳兰和斯托克哈默(2005)	土耳其、韩国	土耳其:1965—1997年 韩国:1970—2000年	SVAR	—	土耳其在短期是工资引导型;韩国在长期是工资引导型
纳斯迪帕德(2006)	荷兰	1960—2000年	OLS AR(1)	工资引导型	工资引导型
纳斯迪帕德和斯托姆(2007)	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	1960—2000年	OLS AR(1) ARIMA	法、德、意、西、荷、英为工资引导型;日、美为利润引导型	法、德、意、西、荷、英为工资引导型;日、美为利润引导型
斯托克哈默、奥纳兰等(2007)	欧元区	消费和净出口:1962—2005年;投资:1968—2005年	OLS AR(1)	工资引导型	工资引导型
埃德和斯托克哈默(2007)	法国	1960—2004年	OLS	工资引导型	利润引导型
海因和沃格尔(2008)	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美国	1960—2005年	OLS AR(1)	—	澳、荷为利润引导型;法、德、英、美为工资引导型
奥纳兰和格兰尼斯(2012)	G20国家	发达国家:1960—2007年;发展中国家:1970—2007年	OLS AR(1)	工资引导型	欧洲国家、土耳其、日本、韩国和美国为工资引导型;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中国和南非为利润引导型
王鹏(2009)	中国	1993—2007年	VAR	利润引导型	利润引导型
黄乾和魏下海(2010)	中国	1993—2007年	SVAR	工资引导型	—
莫雷罗·西马罗(2015)	中国	1987—2007年	OLS AR(1)	利润引导型	利润引导型
刘盾、施祖麟等(2014)	中国	1981—2011年	OLS AR(1)	工资引导型	工资引导型
赵峰、陈宝林等(2018)	中国	1978—2015年 1993—2015年	OLS 面板	工资引导型	利润引导型

资料来源:参考 Hein 和 Vogel(2008)以及刘盾和施祖麟等(2014)的研究^[24-25],根据相关文献整理^[26-30]。

笔者认为,虽然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其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思路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分配制度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收入分配状态同样是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是一种对经济体的经济实践中收入分配状况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定量刻画科学方法的科学方法,其无疑也适用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体制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使用巴杜里-马格林增长模型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得出的结论大多是中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①,而“总需求体制”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②。

四、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当代价值

不同于凯恩斯,卡莱茨基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为基础,不仅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论述,还引入数学模型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理上的分析。卡莱茨基主义学派在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以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石,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这一宏观经济学经典问题,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分析范式。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收入分配问题处于次要地位,且完全是内生的。在一个完美的新古典竞争模型中,收入分配被设定为由边际生产率决定,工人的工资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31]。而在卡莱茨基及其继承者看来,收入分配取决于垄断程度,垄断程度又受行业集中程度、工会影响力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收入分配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关键性影响。继承卡莱茨基思想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的决定并不是纯粹的内生现象,它会受到一系列外生因素(如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③,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具体的分配制度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因此,卡莱茨基主义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分配既是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又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消费的升级,能否处理好分配问题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已成为事实,曾经能够维持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的市场供求条件、经济结构条件、体制条件和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调整增长速度目标、升级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常态增长^[32]。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应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分配公平和“以人为本”,以实现可持续的、包容共享的高质量经济发展。

其次,制度体系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分配制度只有与经济增长体制相配套才能更好地实现

① 除了王鹏(2009)和 Molero-Simarro(2015)的研究^{[28][30]}。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选取的指标数据及时间区间不同。比如,王鹏(2009)对劳动份额的计算忽视了2004年中国劳动报酬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并只考察了1993年以后的数据;而 Molero-Simarro(2015)的研究则没有考虑中国经济经历的特殊节点——1993年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 除了刘盾等(2014)的研究^[25]。刘盾等(2014)的研究之所以得出与其他研究不一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它考虑了出口产品价格水平和进口产品原材料价格水平,而其他研究只考虑了汇率水平,并未考虑进出口品的相对价格。

③ 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收入分配关系产生影响,比如:通过提高工会议价能力等对初次收入分配产生影响,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等对再分配产生影响,等等。

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真空发生的,而是被一系列制度支撑的^①,制度安排只有与经济增长体制相匹配,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根据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在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时,首先需要确定当前是怎样的经济增长体制,只有确定了具体的经济增长体制,才能更好地制定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匹配。具体来说,当经济体制属于“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时,需要实施亲劳动的分配制度;而属于“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时,则需要实施亲资本的分配制度。例如,根据已有研究结果,中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国内有效需求扩张,进而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在这样的经济增长体制下,提高劳动者工资份额,不仅能够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公平性),还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但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注意中国经济增长所经历的一些特殊节点,比如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及1993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些特殊节点上,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包括收入分配制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验研究中需要进行分阶段的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或者通过模型改进以消除其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第二,对“总需求体制”的判断需要谨慎对待。当“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时,“总需求体制”的判定比较复杂,对于“贸易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相对大小的判断也比较困难。笔者认为,此时不宜简单地依赖实证分析结果,而应结合中国经济实际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在2015年以前,利润引导型的“总需求体制”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因为基于低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导致国外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使国内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处于相对次要地位;而在2015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则可能导致中国的“总需求体制”逐步转变为工资引导型。

经济理论必须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当代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应用,更在于发展。当前,中国经济转向更多依靠内生动力的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能否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作出积极贡献?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基于有效需求理论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没有区分国内经济系统与国际经济系统;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应用往往都区分了“国内需求体制”和“总需求体制”,且分析发现国际贸易的发展可能使“总需求体制”与“国内需求体制”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增长体制(通常是工资引导型的“国内需求体制”与利润引导型的“总需求体制”并存),但对于这种经济增长体制转化的原因和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这为我们从收入分配视域研究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启示:相比“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更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向,因为其能够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能够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那么怎样才能形成和强化“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以促进国内大循环良性发展?怎样才能弱化国际循环对国内“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的不利影响,乃至使其转变为促进国内“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的发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还有待于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发展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 这种将“制度”嵌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与SSA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不谋而合:SSA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戈登基于一个社会结构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认为,民主化的制度和政策通过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广泛的民主参与提高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表现^[33]。法国调节学派的布瓦耶也指出,不同的制度结构(竞争结构、劳资关系、国家干预、国际和货币规则等)与不同的积累体制的结合会对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不同的影响^[34]。

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琼·罗宾逊.卡莱茨基与凯恩斯[J].经济学译丛,1983(1):67-69.
- [2] BODDY R, CROTTY J.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5(2):1-19.
- [3] 米哈尔·卡莱斯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4.
- [4] 秦蒙.对卡莱茨基主义增长理论的批判性评述——基于对罗桑和巴杜里-马格林模型的考察[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6):202-224.
- [5] KALECKI M. Outline of a theory of the business cycle[M]//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1-14.
- [6] KALECKI M. The Marxian equa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modern economics[J].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1968(6): 73-79.
- [7] 颜鹏飞,崔孟修.卡莱茨基经济学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0(4):60-66.
- [8]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VIANELLO F. The pace of accumulation[J].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the Surplus Approach, 1985(1):67-87.
- [10] SARDONI C. Marx and Keynes on effective demand and unemployment[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18(3):419.
- [11] DUMÉNIL G, LÉVY D. Being Keynesian in the short term and classical in the long term: The traverse to classical long-term equilibrium[J]. Manchester School, 1999, 67(6):684 - 716.
- [12] FEIWEL G. The legacies of Kalecki and Keynes[M]//SEBASTIANI M. Kalecki's relevance today[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56.
- [13] 冯金华,徐长生.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
- [14] KALECKI M.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15] STEINDL J.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2.
- [16] HALEVI J. Kalecki,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surplus approach[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1):79-92.
- [17] 罗伯特·罗桑,秦蒙.需求、实际工资与经济增长[J].政治经济学报,2019(1):177-207.
- [18] DUT A K. Stagnation, income and monopoly power[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1):25-40.
- [19] TAYLOR L. A stagnationist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5(4):381-403.
- [20] AMADEO E J. Notes on capacity, 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J].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1986(5):83-94.
- [21] COMMITTERI M. Some comments on recent contributions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J].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the Surplus Approach, 1986(2):161-186.
- [22] LAVOUIE M.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foundations[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14:360.
- [23] BHADURI A, MARGLIN S.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of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4):375 - 93.
- [24] HEIN E, VOGEL L.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 empirical results for six OECD countr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 2008, 32(3):479-511.
- [25] 刘盾,施祖麟,袁伦渠.利润拉动还是工资拉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4(2):3-28.
- [26] 赵峰,陈宝林,章永辉,季雷.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10):21-29.
- [27] ONARAN O, STOCKHAMMER E. Two different export-oriented growth strategies: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urkey and in South Korea[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05:65-89.
- [28] WANG P. Three essays on monetary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D].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Ottawa, 2009.

- [29] 黄乾,魏下海. 中国劳动收入下比重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 2010(4):121-127+113.
- [30] MOLERO-SIMARRO R.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ggregat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hinese economy, 1978—2007[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5, 29(4):435-454.
- [31] LAVOIE M. STOCKHAMMER E. Wage-led growth: Concept, theories and policies[R]. Paper written for the project “New perspectives on wag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otentials of wage-led growth”, 2012.
- [32] 权衡. 经济新常态与收入分配:影响机制、发展趋势和应对措施[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5):39-47.
- [33] GORDON D.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Social structuralist macro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economic policy[M]//EPSTEIN G, GINTIS H.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ra: Studies in investment, saving and fi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335-383.
- [34] BOYER R. Formalizing growth regimes within a regulation approach[M]//DOSI G, FREEMAN C, NELSON R, et al.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glob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1987.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Kalecki'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QIN 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Kalecki propose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ve capitalism based on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demand, Kalecki'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specifically discussed the action of capitalist income distribution o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ause for economic periodic volatility. The Kaleckian school who inherited Kalecki's ideas further emphasized that income distribution is the key determinant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Kaleckian growth model has become one of the standard paradigms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to analyz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problems. The ideas that “income distribution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and tha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fit for economic growth system in Kalecki'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re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also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deepen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Kalecki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can be used to study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ystem but should be optimized based on economic practice. Only by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to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esearch, can Kalecki'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model embody and play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 Kalecki;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ic growth; effective demand; wage share; Kalecki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CLC number:F01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21)01-0012-12

(编辑:段文娟)